

|天
Borderless
|下

政体和 文明

许章润 著

POLITY
& CIVILIZATION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政体和 文明_对谈录

许章润 著

POLITY
&
CIVILIZATION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政体和文明:对谈录 / 许章润著.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118-8548-7

I. ①政… II. ①许… III. ①政治体制—研究—中国 IV. ①D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2554号

政体和文明:对谈录
许章润 著

责任编辑 高山 易明群 李峰云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A5
版本 2016年3月第1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印张 11.25 **字数** 259千
印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7-5118-8548-7 **定价:** 59.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许章润 安徽庐江人。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说法 活法 立法》《法学家的智慧》《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汉语法学论纲》《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政体与文明》以及散文集《六事集》《坐待天明》。

主治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尤其关注“中国问题”意义上舶来理念与固有生活调适过程中的法政方面，而念念于中国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现代重构性阐释，汲汲于儒家优良传统的法学复活和中国之为一个法政布局与文明意义，追求法律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寻索学术的人道意义。

序 言

对谈录八篇,零思碎语,曾多刊行,尚未辑集。承蒙高山小友张罗,明群、峰沄小友操作,合为一册,遂得付梓,流布人间。

一言以蔽之,八篇文字,立足近代中国语境,以政体为主题,而延展于文明兴衰的内在脉络,特别是在现代文明语境下,如何经由政制组织人群,建设政治,蔚为大端,而这也就是全书的问题意识所在。晚近以来,“双元革命”引导世界,人间秩序奠立于“民族国家—文化立国”与“民主国家—政治立国”。前者为民族和文化单元,也是一种法律和政治格局,将人群作地缘归类,使世界分割为列国体制;后者表征其政治形态,也是它们可能有的较好组织方式,指向善制和善治,致力于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人生在世,无分个体抑或群体,自我保存第一,也就是和平第一,由此而有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的必要及其分别。在此,双元接续,分趋合力,纽结一体,既在辖制人世,提供安立之地;更在料理人生,汲汲于营建良善社会、正派人间,以认同机制和承认政治收束人心。它们自西徂东,铺天盖地,建构起一种人世生活,致使一切政治建国和文化立国的努力,无不辗转起伏于这一框架之中。

此番更张,始自十六世纪以还地中海文明,拓展至十九世纪起始的大西洋文明,呼啦啦,轰隆隆,成就了一个现代世界。如今潇潇飒飒,山重水复,而山止川行,天成地平,乾坤运势仿佛到了太平洋文明时段。清末以还,一个半世纪里,华夏熙攘,起居于此,正为此政治建国和文化立国的漫漫进程,映射的是中国文明响应现代早期以还这一波现代文明的拍岸大潮,而贞下起元的曲折历程。如此这般,其主题和主体,正不外乎政体与文明也。

此一主题,概为立国与立宪,核心在于建构优良政体,以现代政治涵养国族心智,期期于导引中华民族渐成现代政治共同体。其之极致,迄今而言,正不外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其间,通常理路是以国家理性武装国族心智,而以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缺乏公民理性的折冲,则国家理性难免嚣张独大,有可能将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只有承载于优良政体的国家及其国家理性,才能获秉伟大的道德尊严,也才可能导向良善生活。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也正是在此,刻下中国有待临门一脚,以最终完成政体转型,恪尽已然延续一个半世纪的政治建国大业。

此一主体,接续连绵,时空浩瀚,表征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其经史义理,其诗礼文教,其伦理纲常,其王道政治理想,其家国天下的情怀、气度和格局,其生聚作息,其兴衰消长。就晚近情形来看,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一直处在“古今中西”的错综时空,一个大转型的时代湍流之中,而孜孜于立教与立人的千年基业。换言之,如何在立国和立宪的同时,重建中国文明的意义本体,于天人、生死、祸福、义利、出处两极,在身、家、国和天下诸端,恰予解说,统予转圜,由此彰显中国文明的内在道德

张力,提澌中国人生的生存境界,最终形成现代中国及其现代秩序,道尽了此一主体的时代命运,也是衡估其成败得失的基本语境和评判标准。现如今,过尽冰霜,不争春秀,而春华秋实,自然更替,不待人谋,繁华与贫困俱现,更加豁显出建设中国文明的意义世界,特别是它的宇宙图景、生死义理和国家哲学的紧迫性。

区区既以法政学思为业,则不避愚拙,舌敝唇枯,绉句绘章,积思积虑,无非此一主题;半生早已耽溺于无用功,则辗转反侧,夜静更闲,心凝形释,念兹在兹,不外此一主体。盖生息其间,命运与共,无所逃遁,只能勉力前行,积劳积慧,致善于万一,而可望保性命,求安生,增福祉,得自由。非止此生此世,一时一地,毋宁,当下与未来,小我共社群,子孙后代之和平共处,家国天下之安宁祥和。此为愿景,终究有指望而无把握,才更需时时怵惕,处处用心。虽说人性邪恶,人心险恶,而人世丑恶,可毕竟,人生美好,人类终究善好,并可能永恒趋向于善好,则悲辛交集之下,所能指望而依托者,其实,唯有政体和文明两项矣!

各篇初刊后,续有修订,务期信达,力求雅致,在传达笔者心意之际,体现汉语顿挫抑扬之美。对谈者屈高就下,先有对谈命题之设计,后有现场讨论之费时费力,继复慨允辑刊,难为他们,一并布谢!

2014年3月30日于故河道傍

许章润谨志

目 录

- 甲篇 / 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 / 3
- 乙篇 / 中国可能创造出一种新文明? / 57
- 丙篇 / 国家理性与建国道路 / 129
- 丁篇 / 优良政体的中国语境 / 161
- 戊篇 / 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看优良政体
的形成 / 199
- 己篇 / 什么是“人民” / 227
- 庚篇 / 这个世界会好吗? ——谈梁漱溟
与中国的现代化 / 283
- 辛篇 / 法学教育、大学精神与学术的人道
意义 / 327

甲
篇

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

一个历史学家与法政学家的对话

目 次

- 一、“改革开放”的接力赛与近代史上的“枢纽期”
- 二、“立国时刻”与“立宪时刻”
- 三、日常政治与平庸政治
- 四、有效统治,抑或良治?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改革开放”的接力赛与近代史上的“枢纽期”

历史学家:2009年10月前后,适逢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加上头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清末立宪一百周年,若干重要年份连缀,可谓时间焦点。空间因为时间而启动了自我定义进程。一时间,万众瞩目,举国钟情,舆情鼎沸,压抑不住,好不热闹。

不过,细加观察,仅就华文世界而言,虽然诸议纷纭,歧见尽出,然所论不外“六十年”的得失与功过,总结和瞻望齐至,褒奖和批判俱来,而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分,以及“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历史阐释,更有“第三共和”的期许与憧憬。即就“后三十年”而言,一种意见认为,细加区辨,实有“第一次改革开放”(1978~1989年)与“第二次改革开放”(1992年至今)两个段落,或者说,“一场改革,两个段落”。还有一种意见申论,这场改革已经死亡,需要重启改革。抛开林林总总的表象,凡此议论意欲阐释和接续的核心命题,在我看来,主要是关于政治正当性和政权的转型问题,多所期盼于政治体制改革,吁求以中国民主化之完成为百年现代化进程收尾。

官方早有定见,开动一切舆论机器,自不待言。因为自说自话,不沾学术,暂搁一边。至于学界袞袞,则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莫衷一是,极相轩轻。法学界也有不少议论,诸如三十年“法治建设成就”的著述,六十年法制历史的梳理,学理性的与资料性的,一家之见抑或东拉西扯的,甚至帮腔拉调的,或深或浅,有盐无味,一时间颇有些文字问世。

当其时,阁下好像刊行过长文《中国的法治主义:背景分析》,并主编了“历史法学”第二卷《中国:法制与法意》,以为迎合,但

并未就此历史时段发表过针对性分析和宏观性评论。我想知道，作为一个法学家，你如何看待这六十年呢？

法政学家：法学家不是法律家，本为知识阶层的一份子，所论为书生之见，可能多带法政哲学的视角而已。职业所系，志业所在，他们可能更多关注制度建构及其正当性转型与合法性论证诸题，汲汲于公义的制度供给和法权程序安排。指向和憧憬不外乎此，唯更多平面性形式主义思考，多落笔于结构性考量，此外无他。笔者当时写作《中国的法治主义》一文，正是基此定位，期于梳理既往而明示今后，也算是知不可而为之吧。

阁下谈到“建国”，则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打发，实牵扯到一个更为绵远悠长之历史意象。此处阁下所谓“建国”，自然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体，实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这一政体 1949 年奠立，国朝用语，定位“新中国”，在“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迈背后，表明的一种“结束”与“开始”叠合于某一起端的辩证法，既将正当性塑成金身，同时寄寓着开辟万世太平的治道愿景。实际上，1840 年以还的乱世纷扰，至此归结于一统天下，也还真是告一段落了。粗略分界，此一政体前后各三十年，骎骎乎六十华诞。一甲子，华夏历史时间中的一个颇含寓意的周期，冥冥中似乎皆有定数。因而，学界和媒体借机起义，希望于现实层面有所推动，更续新章，自属常情，未脱常理，也是一种常例。当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找由头说话，说自己想说的话，为别人说不好说出口的话，新做派循沿的实为老传统。

不过，就此刻的话题而言，假若放宽历史的视野，将心胸拓展，各自卸下历史的包袱，如自中国近代转型，由“朝代国家”向现

代“民族国家”或者“国民国家”递进立论，则中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起自清廷覆灭的1911年，迄今已然百诞。此前为“大清”，帝制，“老中国”；此后为“民国”，也就是共和国，“新中国”。“辛亥”之后，虽迭遭复辟、分裂之患，政制和政治一时间均不上轨道，社会反更跌宕，乃至人心多所幻灭，诟议“民国不如大清”，乃至有袁氏复辟一出，但是，今天远距离遥观，平心而论，毕竟，民国初立，一个新型中国从此出现，而为此后一切更张奠立型制，筌路蓝缕，伟业既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便是“1911”的开天辟地之处，无法抹煞，更无从取代。“1949”本心承接的正为这一正朔，打倒的只是“国民党反动派”和“人民公敌蒋介石”，而似乎欲将共和建国于此收尾，以续道统之一脉绵延也。这一话题，我们在后面“立国时刻”和“立宪时刻”部分还将详述，此处暂且不表，只需提一下当年立国号，毛泽东本人嘱意于沿承旧称，即可见一斑。试想，不论1927年后的“民国”抑或更后的“人民共和国”，哪一个不是在此型制上辗转腾挪，即便号称另起炉灶，也依然脱胎于此，增减装饰而已，偏左偏右罢了。因而，“新中国”之“新”，当自此刻起步，假若不待成见，谅能获得各方认同。

而且，往远处看，若从华夏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形态立论，则“中国”已然存续数千年，耸然于东亚，面朝浩瀚太平之洋，哪里只是区区一甲子。四百来年前，西方近代转型、民族国家成长的嚆矢之际，追求的便是世俗主权国家与文官体制，而凡此两者，“老中国”早已俱备，沿承接续，蔚为型制，备极成熟，自非同日而语。当年萧公权先生作《中国政治思想史》，浩浩凡70万言，伸言欧洲近代列国体制发育生长先于吾国三数百年，而若以开国以早迟

论,“则我老大而彼少壮”,既征此意,复衍此义。^①

因此,只就“六十年”谈“六十年”,或许会因视域有限与现实的遮蔽而影响我们的判断,这与囿于利益纠缠和“意蒂牢结”而不免于私心,虽然用意迥异,而结论难免偏颇,事理同一。基此,我愿意将这“六十年”放在一个更为长程的历史时段下来考察,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照,比如,不妨至少将视线投向1840年以还的170年之中。于此广大场景,细观波澜,抚慰曲折,省视当下;纵贯长程时段,历数教训,探究根由,瞻望将来。如此这般,也许更能看出事情的脉络,在叙事中厘清故事,于理述中勾抉理论,将追寻真事实情的努力落实于究迹原情,而庶几乎得其平准。

此一思路既清,则诸端不待人谋,迎刃而解,近代中华民族救国建国的脉络自然一通百通。例如,小而言之,现代中国海军的成长史和建军年份的计算,至少当自北洋水师创立起算,方合历史事实和一般情理。北洋之后,复有民国海军,解放军水军的最初装备就是虏获的民国水师,此后逐步积累,至今而有航母作为镇国之宝,载述和见证了中华民族建立现代国家接力长征的筚路蓝缕。倘若此事因为涉及“国体”,致有纠结,那么,倘非如此,则其实一笔带过,依史实讲史事就是了。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创立元年,当然分别启自1898年设置的京师大学堂和1911年饬立的清华学堂,而非1953年的“院系调整”。今天两校分别先后举行百年校庆,官方应允而不谄,正说明心胸辽阔,尊重历史,并不强作另解。比诸海军,其理昭然。余可类推,事实和心胸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俱在其中矣！

否则，所谓“六十年”，总有基于特定历史叙事的“元年”之嫌，作为一种标立合法性的政治技艺，自无不妥，而于平心论史，公心论事，仁心论人，则多难免隐曲，无历史性，反政治。阿伦特说，“自由理念与一个新开端的体验当是一致的”，而“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一如君宪之迥异乎共和。凡此辟论，对于有过惨痛历史教训，而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成熟的国族心智的时代而言，足值镜鉴。

说到这里，不妨多说一句。意大利当代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在论及“时间与历史”时说过的一句话，颇见心得。在他体认，每种历史观都必然伴随着某种“时间经验”，每种文化首先都是对于时间的特殊经验，没有对于这种经验的改变就不会有文化的更新，不会产生出新的文化。因而，“一场真正革命的原始任务，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改变世界’，而是——最重要的——是改变‘时间’”。^①换言之，历史从来就不只是一种时间，是对于时间的经验，由此而有历史观念，以及通常所谓的文化。没错，改变世界常常是从改变时间开始的，并且以对时间的改变为结果。想一想今年是“2009”或者“2012”，就知道曾经发生的“革命”导致基督教西方世界对于传统中国文明世界的改变是何等深刻。那么，“1911”或者“1949”，以及随之而来的“建国六十周年”还是其他什么，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其他种种，不妨类推。

^① [意]吉奥乔·阿甘本：“时间与历史：瞬间与连续性的批判”，收见氏著《幼年与经验：经验的毁灭》，尹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